

# 第一章 緒 論

他們無法脫逃其經濟和社會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易言之，他們不得不受其階級境遇的主宰。他們的人數因工業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顯著增加……年輕的溫斯頓·邱吉爾（當時是自由黨閣員）曾警告英國國會說，如果保守、自由兩黨的政治制度崩潰，則它將為階級政治取代。當他在說這番話時，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些人。

艾瑞克·霍布斯邦〈帝國的年代〉

##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美國黑人學者 William J. Wilson (1987) 在其著作「真實的弱勢者」(The Truly Disadvantaged) 一書中，探討美國黑人貧民窟崛起的成因。當時美國的主流觀點傾向將黑人貧民窟問題歸咎於種族歧視，而不認為與美國的經濟組織有所關聯。然而，Wilson 對這種觀點加以反駁，並提出調查數據證明黑人貧民窟的社會問題在 1970 年代的人權運動之後不但沒有獲得改善、甚至更加惡化；他認為癥結是在種族特性 (race-specific) 的公共政策，包括「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因為它只讓少數族裔的中上階級獲取額外的優惠，但實質弱勢的中下階級卻沒有因此獲益，反而備遭歧視。此外，美國政府的許多經濟政策，例如產業外移等，壓縮了藍領階級的工作機會，令黑人貧民窟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易言之，問題的關鍵並非種族，而是「階級」；因此，他提倡涵蓋性 (comprehensive) 的公共政策，期使改善貧民窟下層階級民眾的生涯機會。這種論述挑戰了當時自由派的觀點，即使 Wilson 向來以社會民主主義者自居，卻仍被貼上新保守主義的標籤；儘管如此，這些批判的火焰也照亮了黯淡已久的邊陲，促使美國各界對社會問題關注的焦點不再侷限於種族問題，而逐漸關照到「階級」的議題。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台灣。歷年來關於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觀察重點

多半聚焦於「省籍族群」以及「統獨」議題的影響力，甚少著墨在階級因素上。事實上，在許多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社會階級」(social class)經常是左右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力量，有些學者更把階級動員視為「歷史的馬達」(the motor of history)，認為「民主的階級鬥爭」(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 (Evans,1999：1；Lipset,1981：230)。儘管晚近歐美學界對「階級」的政治影響力迭有爭議，卻不減損它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佔有的份量。相較而言，台灣可能由於長期的經濟成長，階級流動的管道相對暢通，「愛拼才會贏」的觀念深植民心，有關階級利益的訴求似乎不容易挑起多數選民的政治狂熱，也甚少成為選戰的主要議題，只能在統獨與族群動員的選戰煙硝中隱隱發酵。

綜觀台灣政經發展的歷史脈絡，由於國民黨過去長期扮演利益代表獨占以及反向政治動員 (demobilization) 的功能，使得以階級利益為號召的政黨無由出現 (朱雲漢等,2001：1)。即使在解嚴之後，情況也沒有太大的轉變，舉例而言：以社會運動起家的民進黨，隨著政治版圖的擴張，已經與社運團體漸行漸遠；旨在爭取勞工權益的工黨則是曇花一現，未能成為氣候；曾經標榜「中產階級代言人」的新黨，也由於政治環境和意識型態的侷限，以致於都會黨與外省黨等陰影覆蓋了該黨所欲訴求的階級色彩。整體而言，從政治發展的軌跡來看，台灣似乎還沒有形成「階級政黨」或「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的總統大選之後，台灣的政黨體系出現大幅度的重組。民進黨首度取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成為在野黨；另外，從國民黨出走的宋楚瑜與李登輝，分別籌組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 (簡稱台聯)，新黨則在邊緣化危機中保有一席之地。至此，台灣的政黨體系可劃分為「泛藍」(包括國民黨、新黨、親民黨)與「泛綠」(包括民進黨、建國黨、台聯)兩大陣營；一般認為，泛藍陣營偏向支持統一、泛綠陣營偏向支持獨立，其間有一條族群的界線隱然劃過。然而，我們感到疑問的是：除了統獨與族群分歧之外，

藍、綠陣營的支持者是否存在其他的區隔呢？試想，倘若只有「統獨」與「族群」構成主要的政治分歧，為何具有族群動員優勢、並號召「新中間路線」的民進黨，仍無法在政治版圖的競逐上穩居絕對優勢？而泛藍陣營如果沒有獲得相當比例的本省閩南籍選民支持，也不可能有問鼎中央的實力。因此，我們假定尚有其它政治分歧的存在，其中「階級」即是本文觀察的焦點。

從以往藍、綠陣營的造勢場合中，經常可以看到「檳榔與拖鞋、西裝與皮鞋」的鮮明對比（吳乃德, 1998），這也是一般民眾對藍、綠支持者「階級分化」印象的由來，亦即：中上階層比較支持國民黨，中下階層比較支持民進黨。不過，這種主觀印象似乎仍欠缺足夠的客觀證據，所以本文將從歷年選舉調查訪問資料的分析中驗證：台灣選民是否具有「階級投票」(class voting)的傾向？也就是說，不同階級的選民，其投票行為是否呈現顯著的差異呢？

其次，儘管台灣尚未產生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體系，但「階級重組」<sup>1</sup> (class realignment) 的問題卻同樣值得觀察。相對於許多西歐國家與澳洲等「凍結」在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體系，階級政治的缺席反而會增加階級重組的可能性；因為從美國的例子可以發現：當政黨為了吸引該黨所能爭取的階級選民而修正該黨的傳統訴求時<sup>2</sup>，這些階級選民會將其政治忠誠從某一個政黨轉移到另一個政黨（Hout et al. 1999：84）。台灣從 1987 年開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一直到 2000 年的首次政黨輪替，十餘年期間，已經從國民黨的一黨獨大、演變成為兩大陣營的分庭抗禮。我們想要了解的是：在台灣政黨重組<sup>3</sup>的過程中，「階級」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沒有出現「階級重組」的現象呢？

---

<sup>1</sup> 「階級重組」即為階級之間的政黨重組，也就是支持某政黨的階級基礎已經發生改變。

<sup>2</sup> 在 1992 與 1996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Bill Clinton 將這種手法展露無遺，他卸下民主黨熟悉的勞工階級的訴求，直接招喚中產階級。1992 年時他以健保改革方案吸引藍領與白領勞工，而在 1996 年則以承諾保障中產階級的權利，如敬老敬貼與醫療保險等，並保證以就學貸款補助高等教育，這些政見訴求都擴大了中產階級對他的支持（Hout et al., 1999：84-85）。

<sup>3</sup> 「政黨重組」是指政黨體系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政黨的支持者重新排列組合（Sundquist, 1983：4）。經過選舉之後，即使原居多數的政黨再次獲勝，支持該黨的選民社會基礎若已發生改變，並且產生一個新的政黨均衡，即是「政黨重組」。政黨重組的前期會發生「政黨解組」(party dealignment) 的現象，選民原有的政黨認同逐漸鬆動或對原政黨失去向心力。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無論台灣有沒有「階級投票」的情形，階級政治的匱乏卻是不爭的事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是因為「階級」在台灣真的沒有顯著的影響力，抑或是「階級」被隱藏在其他的政治分歧當中、以致於相形黯然而已？舉例而言，有些學者發現台灣的「省籍」與「階級」之間存在相當的關聯性，因為台灣的階級流動經常取決於教育機會，當不同省籍的選民在教育程度上出現落差時，就會形成族群之間的階級差異，使得「省籍」與「階級」高度相關，也與政黨支持趨於一致（吳乃德, 1998；駱明慶, 2002；徐永明, 2003）。也有學者發現，諸如省籍、居住地、教育程度、家庭所得差異等社會區隔，對於統獨立場有顯著的影響，於是統獨議題與社會區隔的連結，讓社會區隔產生了動員的效果，也致使統獨議題得以成為凸顯的政治分歧（盛杏媛、陳義彥, 2003: 20-21）。因此，為了釐清「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我們也要分析「階級」與台灣幾個主要的政治分歧之間的關係，以期了解：在族群與統獨分歧的表象裡，是否隱藏著階級分歧的真相？

簡言之，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包括：

一、「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係為何？這個問題可以再分為兩個面向：

- (一) 台灣選民是否出現顯著的「階級投票」(class voting) 現象？
- (二) 在台灣政黨重組的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階級重組」(class realignment) 的情形？

二、「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為何？這也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探討：

- (一) 「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因素之間是否有顯著的關聯性？
- (二) 在控制其它政治分歧因素的影響力之後，「階級」是否仍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爲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將依循如下的脈絡鋪陳。首先，我們以歷年選舉的調查研究資料，觀察台灣選民「階級投票」與「階級重組」的情形。其次，我們再分析「階級」與當前幾個主要政治分歧之間的關係，以了解這些主要政治分歧的背後是否蘊藏著階級的分歧；然後，我們再將這些變數一併加以觀察，探討在控制其它變數的情況下，「階級」對於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爲是否仍有顯著的影響，藉以釐清「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依循上述脈絡，本文將分爲三個部份來做文獻探討。第一部份，我們從階級理論出發，藉以了解「階級」爲何會影響一個人的投票行爲；第二部份，我們從國內、外有關「階級投票」的研究結果，探討「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係；第三部份，我們將分析「階級」與國內主要政治分歧之間的關係。以下分別就從這三個面向，對相關文獻略作整理：

### 第一部份：階級政治的相關理論

「階級」是社會科學研究中跨領域的重要議題，相關理論與文獻汗牛充棟，難以逐一詳述。由於本文旨在探討「階級」對於投票行爲的影響力，在此僅針對「階級」的定義、階級的組成、階級的因果要件、及主要的學說流派，做一簡單扼要的說明：

## 一、階級的定義

探討「階級」的定義，必先釐清「階級」(class)與「階層」(strata)的差異。首先，人類社會都存在著因為價值與榮譽的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為了描述這些不平等的現象，社會學家提出了「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概念。

「階層」可以被界定為不同人群之間結構性的不平等，在這個結構當中，居於上層者擁有較多的優勢、愈接近底層者就愈少特權。人類社會至少可以區分出四種基本的階層體系，包括：奴隸、種姓、身分與階級 (Giddens, 1997: 220-221)。

「階級」雖然是階層體系當中的一種，但是「階級」與「階層」在許多層面上仍有所差異，包括：

- 1、「階級」並非由法律或宗教規定來建構。階級的體系比其他階層類型更具變動性，階級之間的界線也從未明確劃分。
- 2、個體層次的「階級」至少在某些部分是被成就的 (achieved)，不像其他階層體系普遍是依先天既定的 (given)。
- 3、階級是依個人所屬團體的經濟差異而決定。而在其他類型的階層體系中，非經濟的因素（如印度種姓制度是受到宗教的影響）通常是最重要的。
- 4、在其他類型的階層體系中，不平等主要表現在特定或義務的人際關係上，如農奴與領主。階級的不平等則是經由大規模的非個人 (impersonal) 接觸的方式，例如，階級差異的重要基礎之一是工資與工作條件的不平等，這些條件是影響特定職業領域中的每個人，是整體經濟環境的結果。

因此，「階級」可以簡單界定為：享有同等經濟資源的大規模人群組合，而此經濟資源強烈地影響到他們可以主導的生活方式的類型。一般而言，財富與職業是階級差異的主要基礎 (Giddens, 1997: 223)。

## 二、階級的組成

由於「階級」具有以上的各項特質，所以它並不像其他階層體系一樣有明確的劃分界線。許多社會理論假定「階級」是一個為共同認可的目標而奮鬥的自覺性（self-conscious）團體，然而，這個假定卻被其他理論家所挑戰，他們認為所謂的「自覺」不過是把那些被研究者加諸在情境上的分析概念加以實體化而已；換言之，階層差異的確存在，這些差異也會影響到態度與行為的差異，但這並不能證實「階級」做為一個團體有其實體性、或是階級成員會把「階級」當做行為決定的參考點以致於在行為上產生區隔（Campbell et al.,1960：335）。

由此可知，「階級」的實體性（reality）是多變化的。在某些情況下，把「階級」概念化為一個團體並不困難；但在其他情況下，它卻是一個模糊的人口集合。然而，「階級」多變化的本質，也是最引人興趣的特徵之一。基本上，做為一個團體，階級的組成包括「客觀的」和「主觀的」兩種，茲分述如下：

### （一）正式組織：客觀的實體性（objective reality）

「階級」就其本身而言，很少變成一個正式化的組織，它並沒有正式的階級領導與階級政策。各種行會組織，例如工會或商會，雖然可以被模擬為保衛階級利益的存在，然而，隸屬於這些組織的人通常只佔總人口的少數。因此，我們必須把「階級」當作一個涵蓋性（inclusive）的實體，才可以對它在投票行為上的影響力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 （二）階級認同：主觀的實體性（subjective reality）

許多政治理論家認為，必須存在一種「我們感覺」（we feel），把階級裡的其他人（不只是其他工會的成員或商人）組織成為一個整體，「階級」才會像團體

一樣影響一個人的行爲。例如，Marx 即以「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 來區分「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 和「自爲階級」(class by itself)，Weber 也強調階級發展的過程裡，行爲者感覺到「他們是生命共同體」(they belong together) 這個階段的重要性。對 Marx 和 Weber 來說，階級差異雖然是導因於經濟秩序，然而，在「階級認同」的感覺還沒有在潛在的階級成員之間擴散之前，「階級」並不存在 (Campbell et al.,1960 : 335-337)。

Lipset 從 1949 年挪威和德國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白領勞工比藍領勞工更傾向支持保守政黨，並非僅是薪水較高的緣故，主要原因乃是「階級認同」(class identification)；此外，他也從美國的個案研究中發現，階級認同會造成政治態度的重大差異，因爲自認爲中產階級的白領勞工當中有 65% 傾向保守，但自認爲是勞工階級的白領勞工只有 38% 是傾向保守的 (Lipset, 1981 : 251-252)。由此可知，「階級認同」對於政黨取向有很大的影響。

### 三、階級的因果要件

「階級」爲什麼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態度和行爲？從 Marx 與 Weber 兩大學派的理論中，Wright (1997) 歸納出三個共通的因果要素，包括：物質利益、行動能力以及生活經驗。分述如下：

#### (一) 物質利益 (material interests)

「物質利益」是人們追求其經濟幸福時所面臨的代價 (trade-off)。每個人在閒暇和消費之間都得面對一些代價，即愈少的閒暇 (愈多的辛勞) 可以產生愈高的消費能力。然而，對資產階級來說，不必工作而擁有高消費能力是可能的，但對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來說，沒有工作就相當於沒有消費能力。由此可知，資產



階級的閒暇－消費代價曲線（物質利益）比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更加有利。

## （二）行動能力（capacities for action）

階級位置不只決定物質利益，也賦予人們特定的資源，以策略地使用來追求這些利益。例如，資本家不只擁有與勞工階級不一樣的閒暇－消費代價曲線，也有寬裕的收入可資開銷於競選活動、或讓兒女在私立的菁英學校就讀，以及僱用對付工會的顧問。而勞工在策略地使用手段工具時，唯一的資源則是時間。因此，Offe 和 Weisenthal（1980）認為，資本家在集體行動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付錢的意願，而勞工在集體行動上的核心問題則是行動的意願。

## （三）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

由於處在一個階級位置，一個人可能因此遭遇某些特定經驗；例如，階級位置顯著地決定一個人遭受不同種類罪苦的可能性，也影響到這個人可能居住的鄰里及其社會網絡，並牽涉到他（她）在工作中被指揮、或命令他人的程度。因此，資本家必須擔心競爭者的挑戰、如何從雇員身上萃取極大化的勞動力，以及投資資源的選擇；勞工階級則必須擔憂覓職、失業、技術落伍與工作傷害。這些憂慮與依附於階級位置的「物質利益」及「行動能力」相連結，也來自於日常的「生活經驗」，從而塑造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信念。

## 四、階級理論的兩大傳統之比較

階級分析有兩大學派，分別為馬克思主義傳統與韋伯主義傳統，Wright（1997）指出兩者的關鍵字眼分別為：韋伯主義的「生涯機會」（life chance）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剝削」（exploitation）。可以分述如下：

### (一) 韋伯主義傳統：生涯機會

依 Weber 的觀點，「階級」並不是共同體，而是代表可能的、頻繁的、基本的共同行動 (communal action)。他認為「階級」是：(1) 許多人在他們的生涯機會上，共同擁有一個特定的因果成分；(2) 這個因果成分表現在排他性的擁有商品與收入機會的經濟利益；(3) 也表現在商品或勞動市場的條件下。

簡言之，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源之數量與種類，會影響一個人在市場交易裡收入的機會。因此，Weber 的階級意涵是：「任何團體，其成員具有相同的階級境遇 (class situation)」。人們與不同種類的經濟資源的連結，授予人們不同種類的經濟機會，並因此塑造他們的物質利益；這些機會是階級成員之間利益之潛在共同性的基礎，並因此建構了共同行動的基礎。

### (二) 馬克思主義傳統：剝削

「剝削」是比生涯機會更加複雜的觀念。剝削的存在，有三個主要條件必須發生：(1) 一個團體的人們，其物質利益是依靠對另一方的物質剝奪；(2) 這個因果關係包含了對被剝削者獲得特定生產資源的不對稱排他性 (asymmetrical exclusion)；(3) 這個因果機制把上述的排他性，轉換成差別性的福利，以致於被剝削者的勞動果實被掌握相關生產資源的人所侵吞。

如果只有條件 (1) 與條件 (2) 發生，並不能稱做「剝削」，只能算是「非剝削性的經濟壓迫」(nonexploitative economic oppression)，它並沒有把勞動的果實從被壓迫者手中轉移到壓迫者身上，壓迫者的財富純粹是憑藉排除被壓迫者獲得特定資源的管道，而不是依賴被壓迫者的努力。然而，在「剝削」關係中，剝削者需要被剝削者，因為剝削者必須仰賴被剝削者的努力。因此，「剝削」不僅定義社會行為者的地位，而且是一套由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互相結合在一起的社會

關係所建構的持續互動的型態。

### (三) 馬克思傳統與韋伯傳統的比較

「剝削」與「生涯機會」的主要區別在於：「剝削」寓含行爲者之間利益的敵對性衝突，生涯機會則沒有。換言之，生涯機會的概念著眼於不同行爲者個人的市場能力（market capacity），「剝削」的概念則預設不同行爲者生涯機會系統化的因果互賴性，也就是：資本家生涯機會的擴增，依賴於工人生涯機會的縮減。

Marx 的「剝削」概念，將階級之間的利益連結成爲固有的敵對性，而不只是不同的利益。Weber 的階級雖然具備行動的共通性，卻沒有堅固的理由去期待這些行動將直接與其他階級對抗，因爲在共同的生涯機會上，並沒有預設物質利益的先天對抗。反觀，「剝削」的概念試圖去認定共同的敵人，而不只是共同的朋友（Wright, 1997：35）。Marx 和 Weber 兩人對於「階級」的不同詮釋，除了產生不同的理論途徑之外，也產生不同的階級分類準則。這個部份，留待下一章再進一步探討。

## 第二部份：階級投票的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從以上關於階級理論的探討，我們可以知道：「階級」不只是一種社會分歧，而且可以成爲一種政治分歧，可見「階級投票」的現象可以在階級理論當中找到立論基礎。不過，由於「階級投票」研究在台灣受重視的程度與西方國家有天壤之別，研究成果也不可同日而語；儘管如此，對於從事台灣「階級投票」的研究而言，國內的研究文獻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因此，以下我們將分爲國外與國內兩個部份，針對「階級投票」的相關研究文獻略做檢閱。

## 一、國外的相關研究文獻

國外有關「階級投票」的研究文獻帙卷浩繁，研究結果也是迭有爭議，在此無法逐一詳述，僅針對投票行為理論、早期的研究成果以及晚近的各项爭議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茲分述如下：

### (一) 理論的建構

「階級投票」的成因，最簡單的解釋就是經濟上的自我利益（**economic self-interest**）。整體而言，左派政黨代表以平等為方向的社會改造工具，低收入團體支持它們是為了能在經濟上獲得改善，而高收入團體對左派政黨不予以支持則是為了維持在經濟上的優勢（Lipset, 1981：239）。「階級投票」的現象正可以印證階級因素在政治行為上的重要性。

然而，階級位置與政黨抉擇之間的關係並不必然是一致的；有些窮人會投票給保守政黨，也有一些富人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這種偏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其他的社會特徵和團體依附（**group affiliation**），如宗教信仰等，在特定情境下是比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更加重要的。一個人在現代社會結構當中可能有各種不同的位置，因而難免遭受具有衝突性的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有些社會位置使他們傾向於保守政黨，有些則使他們偏向左派政黨。面對這種衝突的社會壓力，有些人會以其中一種加以回應，因而出現偏離「階級投票」的現象（Lipset, 1981：240）。

有關「階級投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投票行為研究的濫觴：*The People's Choice*（Lazarsfeld et al., 1968；1<sup>st</sup> edn. 1944）。雖然該書把研究焦點放在影響1940年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抉擇的短期因素上，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結果卻是

「社會特徵」(social characteristics)的重要性，包括階級與宗教。他們發現，社經地位較高的選民傾向投票給共和黨，反之則傾向投票給民主黨 (Ibid : 21)；而且，只要掌握一個人的社會特徵，就可以相當準確地預測那個人的投票取向。簡言之，一個人的社會特徵，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偏好 (Ibid : 26)。

基本上，Lazarsfeld 等人 (1968) 的理論屬於「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ism)，又稱做「社會學途徑」，強調政黨偏好是選民的社會特徵的一個近乎自動化 (automatic) 的產出。然而，這個途徑卻有其限制，因為它無法解釋：既然社會特徵的影響力如此之大，為什麼選舉結果並非固定不變、而會有重大的轉變呢？因此，美國密西根大學有多位學者嘗試提出更完整的解釋模型，即所謂「密西根模型」，又稱為「社會心理學途徑」。

與社會學途徑最大的不同是，「密西根模型」不認為社會特徵與投票行為之間只有一步之遙；相反的，一個人所佔據的社會位置，會影響到他（她）將面臨與家庭、朋友、鄰居、同事等互動的影響力的種類，這些互動的結果（特別是家庭裡）使個人獲得「政黨認同」；每到選舉，選民長期的政黨認同與各種短期的影響力（如當前政治議題、競選期間的事件、政黨領袖或候選人的人格特質等）之間就會進行交互作用，進而產生投票決定 (Denver,1994 : 27-30)。根據「美國選民」的研究發現：主觀的「階級意識」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力，大於客觀的社會階層 (Campbell et al.,1960 : 341)。換言之，「階級」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力，關鍵不在於「階級」這個自變項，而是在「階級意識」這個中介變項；倘若沒有階級意識，則「階級」並不會對投票行為有重大的影響力。

「社會心理學途徑」也可以從意識型態 (ideology) 的角度來探討「階級」與「投票」的關係。例如，儘管早期的研究顯示選民對意識型態和政治議題缺乏認知 (Coverse,1964 ; Campbell et al.,1960)，但是 Key (1966) 卻主張「選民不

是笨蛋」，至少不會比他們所在的政黨體系更傻；換言之，如果政黨提供明確的意識型態選項，選民將可以依據他們的階級利益做為抉擇的基礎，則階級投票將可以強化。另外，Converse（1958）的研究也指出：階級投票在 40 和 50 年代期間的降低，是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意識型態差異減少；因此，美國人沒有以「階級」做為投票抉擇的基礎，是因為政黨沒有提供他們這樣的機會。由此觀之，「社會心理學途徑」的確可以彌補「社會學途徑」在詮釋上的不足之處。

## （二）早期的研究成果

在上述學派奠定投票行為研究的理論基礎之後，許多國家從 1960 年代開始累積的全國性選舉調查，促成了長期跨時性階級投票研究的豐收。自 1970 年代初期開始，大多數的研究發現：「階級」對於投票行為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大致而言，「中下階層的選民比中上階層的選民更有可能投票給左翼政黨」。（Lipset,1980；Alford,1963）。

此外，從跨國的比較研究也可以發現：北歐國家與英國的「階級投票」程度最高，美國與加拿大則是最低的。然而，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不同研究，無可避免地受限於它們的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舉例來說，有些個案是以「收入」來測量社經地位，有些則是以「教育程度」或「職業」為依據；即使研究者使用相同的測量方法，其階級分類的方式也是從非常詳盡、到非常粗糙，不一而足。直到 1970 年代開始，才逐漸發展出可資比較的資料庫、階級分類的方法、以及跨國的階級投票研究。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先驅是 Alford（1963）早期對於系統性跨國分析的嘗試。他檢驗四個盎格魯·撒克遜民主國家（澳、美、加、英）在 1936 到 1962 年之間「階級投票」的趨勢，並使用社會經濟位置的測量，把職業整合為「勞力—非勞

力」(manual-nonmanual)二分法的階級劃分。這個方法成爲許多跨國及跨時期階級投票研究的標準規範。

然而，採用 Alford 指標經常得到「階級投票」正在衰微的結論。例如：Lipset (1981：505) 提出英國、德國和美國在 1945 到 1980 年間下滑趨勢的證明；Inglehart (1990：260) 更進一步發現這些國家在 1980 年代之後階級投票的持續衰退；此外，Sainsbury (1987) 提出北歐國家階級投票的衰退；Lane 和 Ersson (1994：94) 也發現，九個西方工業化國家在 1970 和 1980 年代階級投票的程度比起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時更低，只有法國和義大利兩國有所增加。

即便是以階級政治爲特色的英國<sup>4</sup>，Denver 的研究也發現：1970 年代以後，雙寡頭的兩黨制 (two-party duopoly) 已經開始受到侵蝕，其它小黨的力量逐漸抬頭；儘管認同兩大黨的比例沒有明顯的衰退，但強烈認同者的比例已經大幅度的滑落 (Denver, 1994：52-54)。此外，Franklin (1985) 研究 1964-1983 年期間英國選民投票抉擇基礎的變遷，也發現由於社會結構的改變、議題投票的增加、兩大黨對其傳統支持者吸引力減弱、以及政治世代等因素，造成 1966 到 1979 年這段期間，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係呈現明顯的衰退。

再者，Franklin、Mackie 和 Valen 等人 (1992：385、387) 針對 1960 到 1980 年代期間分歧政治的影響力進行大規模的跨國研究，其研究結果也令「階級投票」衰退的論點得到背書。該計劃以十六個國家的選民投票行爲 (左翼—非左翼) 做模型，結果發現：這些國家在這段時期裡，「社會分歧」(包括階級、宗教、工會成員...等) 在建構個人投票選擇的能力上，幾乎全部呈現衰退的現象。這個結論與 Inglehart 的理論不謀而合。

---

<sup>4</sup> Peter Pulzer (1967：98) 即提出一句廣爲引用的名言：「階級是英國政黨政治的基礎，其餘的都只是裝飾和細節而已。」

### (三) 晚近關於「階級投票」衰退與否的爭議

Inglehart (1990) 的研究指出：當生活水準提昇，民眾的注意力將從經濟議題、轉移到與階級不相關的社會文化議題，於是長期的經濟成長將造成階級投票長期的衰退。他假定需求是固定的，經濟成長會導致民眾對物質生活水準的滿意度增加，不過，期望會隨著經驗而改變，經濟的短期變化可能會影響階級投票的程度；例如，在生活水準快速提昇的 1950 和 60 年代，階級投票呈現下滑，但在經濟衰退的 1970 年代中期則會上升。然而，如果民眾的期望逐漸回歸到實際的生活水準（而非短期的經濟變化），將不會有長期的階級投票趨勢。

Inglehart 並指出，趨向「後現代」價值的轉變，已經為工業先進國家帶來政治議題的轉變：從不計任何代價地強調經濟成長，轉向對環境成本的日益關懷。這個轉變，使得政治分歧從傳統的社會階級衝突，轉向對於文化議題與生活品質的關懷 (Inglehart, 1997: 237)。他也認為：當社會從「現代」轉變為「後現代」的政治環境，階級投票已經呈現明顯的衰退。他的研究採用 Alford 指標，顯示階級投票已經全面衰退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Inglehart, 1990: chap.8)。

不過，也有許多學者主張「階級」與「投票行為」關係的強度會隨著國家而有所不同。例如，Nieuwbeerta 和 De Graff 即認為，雖然許多國家在戰後階級投票的程度已經衰退，但這些研究都是採用「絕對的」(absolute) 階級投票測量，且使用二元的「勞力—非勞力」階級基模；因此，他們主張：倘若採用「相對的」(relative) 階級投票測量，並做更詳盡的階級區分，可以導致不同的結論 (Nieuwbeerta and De Graff, 1999: 47)。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階級投票」的衰退與否，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市場化之後的東歐社會，其階級政治確實正在滋長，許多國家將來可能成為擴張中的



歐盟會員，並顯露出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極化徵象。即使像美國這樣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體系猶未出現的國家，「階級重組」的趨勢仍值得注意，因為當政黨為了吸引該黨所能爭取的階級選民而修正其傳統訴求時，有些階級選民會將其政治忠誠從某個政黨轉移到另一個政黨（Hout et al., 1999：84）。因此，「階級投票」的衰退與否，其爭論的條件應該隨著時空而轉變。

Inglehart 也承認，「階級投票」是否衰退確實迭有爭論。對 Inglehart 來說，反對其命題者是藉由把焦點放在「篩選過的時期、篩選過的國家」的誤解上，並捨棄理論清晰且易於操作的二分法指標不用，代之以對數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這種較複雜的測量方法。他特別挑出 Hout, Brooks,和 Manza（1993）等人的對數迴歸分析中有問題的詮釋，並參照一個使用來自十六個國家、橫跨四個時期的大型資料庫的分析，他指出：Nieuwbeerta 和 De Graff 曾經採用他宣稱的適當方法，得到階級投票的全面式微的證據（Inglehart,1997：255-6）。

然而，Evans（1999）對上述論點提出異議。他認為 Inglehart 會駁斥那些與「後現代政治」觀點背道而馳的發現與詮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沒有人樂見自己所珍視的理論被別人用瑣碎的實證加以否定。不過，他也對 Inglehart 的說法提出修正，因為 Nieuwbeerta 和 De Graff 事實上也是使用 loglinear 和 logistic regression 這類較複雜的測量方法。因此，Evans 結合 Hout、Brooks、Manza 以及其他學者，對階級投票的衰退與否提供新的見解，他們認為：「勞力-非勞力」二分法的理論優越性、Alford 指標動人的單純，都是虛幻的，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真實情況（Evans, 1999：3-4）。他們主張，有關「階級投票」衰退與否的爭論，其關鍵在於：當先進工業國家日益「後工業化」，階級投票的類型是否正在演變？而這種演變可能採取的形式，是被它所表現的方式強烈制約，也就是方法與測量的問題（Ibid：8）。因此，晚近有關「階級投票」的爭議，其焦點並不是「階級」本身的影響力如何，而是在於分析與測量的方法。

## 二、國內的相關研究文獻

國內有關階級投票的研究文獻並不多見。早期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最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民是軍警、黨務人員、團務人員、公務員、教師、學生及文化事業工作者，而支持黨外候選人的比例相對偏高的則為勞工、農民、自營商、工商機構的職員、家庭主婦及自由業者（胡佛、游盈隆，1984：37-38）。雖然這些研究是以職業類別作為觀察的對象，與本文所要探討的「階級」有些差距；不過，由於「職業」經常是劃分階級的標準，所以仍具有參考價值。

林佳龍（1988：121-122）則進一步參照傳統的士、農、工、商等行業為分類基礎，將職業分為七類，分別是農民、工人、軍公教人員、自由業者、自營商人、經理職員、以及其他人員，結果證實：職業與黨派抉擇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此外，由於教育、收入、主觀社會階層等因素皆未顯著影響選民的政黨抉擇，所以他選擇採用「職業」作為階級分類的依據，將這七個職業類別劃分為五個階級，分別是由軍公教人員、經理職員、自由業者合併而成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自營商人）、「小農階級」、「勞工階級」及「其他」。研究結果發現，「階級」與政黨抉擇之間具有極顯著的關聯，因為相較於其他階級，小農階級與中產階級支持國民黨的比例明顯偏高，而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則是支持民進黨的比例相對偏高（林佳龍, 1988：130—131）。

台灣的階級投票研究也有許多是從跨國比較的角度出發。例如，Niou 與 Yu（1999）在比較台灣與南韓的階級投票之後，得出低度階級投票的結論（轉引自朱雲漢等, 2001：8）。朱雲漢、張佑宗、胡克威（2001）也針對台灣與香港在 1995 年與 1998 年兩次國會選舉的階級投票情形加以比較，他們將階級劃分為「資產階級」（含資本家、新、舊中產階級）、「邊際中產階級」與「農工階級」三種，採用多元對數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台灣與香港都是呈現低度階級投票的現象。

他們從社會結構分析的觀點，認為台、港出現低度階級投票的主要關鍵是政黨競爭的策略、以及許多長期結構性因素的影響（Ibid：6-10）。

耿曙、陳陸輝（2003a）則採用不同於西方「市民社會」階級系統的分類方法，將「階級」概念予以重構。他們認為：台灣過去的政經發展經驗形成了類似「國家資本主義」的支配結構，可以「黨-國體制」的親疏做為階級劃分的標準，將台灣的社會階級劃分為「附從階級」、「合作階級」、「自主階級」與「邊緣階級」等四類。研究結果發現：相對於其他階級，在 2001 年立委選舉中，「附從階級」與「合作階級」對於泛藍政黨的支持程度顯著偏高、對於泛綠政黨的支持程度則顯著偏低；反觀，「自主階級」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顯著偏高，而「邊緣階級」自認為無政黨傾向者，則比其他階級顯著偏高。這個結果證實：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存在著因為「黨-國關係」的親疏所造成的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差異。

上述的研究文獻，無論是階級的分類、乃至於統計的方法，幾乎都是莫衷一是，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不過，經由上述的文獻討論，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有關台灣「階級投票」的爭論，仍然沒有定論。這個事實也再度證明測量與分析的方法對於評估「階級投票」的結果，確實影響重大。由於「階級投票」的測量與研究方法包羅甚廣，需要相當篇幅始可概略描繪；因此，本文將另闢專章，留待下一章再做更加詳盡的評析。

### 第三部分：「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的關聯

爲了探討「階級政治」匱乏的原因，本文也將分析「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之間的關聯，以了解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我們從國內的相關文獻出發，

提出幾個可能與「階級」高度相關的政治分歧，包括省籍、地域、教育程度等，這些因素已經被證明可以顯著影響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sup>5</sup>，並且可能影響一個人的階級位置，使得階級分歧可能被隱藏在這些主要分歧當中、以致於其影響力經常受到低估。

此外，誠如 V. O. Key 所言：過分強調投票抉擇的社會決定因素，將會「把政治帶離政治行為」(take the politics out of political behavior)；他從美國 Indiana 跨時期的選舉變遷研究中發現：儘管經歷許多重大的社會變遷，各郡的選票卻仍然呈現高度的相關，可見政治同盟 (political grouping) 某種程度上獨立於其他的社會同盟 (Lipset, 1981: 287-288)。因此，除了前述的各項社會背景因素之外，本文也把焦點放在社會心理因素的探討；以下分別從這兩個面向加以討論。

## 一、 社會背景因素

在既有研究文獻的指引下，本文提出可能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及階級地位的社會背景因素，包括省籍、地域與教育程度。茲分述如下：

### (一) 省籍與階級的關係

台灣的選舉調查研究普遍證實，省籍的差異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力。整體而言，相較於其他省籍的選民，本省閩南籍的選民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較高、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較低；本省客家籍與大陸各省籍的選民比較偏向支持泛藍政黨，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則相對偏低 (王甫昌, 1994；林佳龍, 1988；盛杏媛, 1986；陳啓民, 1999；陳陸輝, 2000；游清鑫、蕭怡靖, 2003)。

---

<sup>5</sup> 有關台灣主要政治分歧的討論,可參閱吳乃德 (1992；1994)、徐火炎 (1998；2001)、盛杏媛與陳義彥 (2003)。

在省籍與階級的關係方面，吳乃德（1998）的研究發現：從階級結構來看，外省籍民眾比較集中分布在中、上階級，本省籍民眾的階級組成則和外省籍民眾明顯不同，因為本省籍民眾的父代有將近一半屬於農民階級，外省籍民眾的父代則有將近四成屬於低級白領階級，然而本省籍民眾的父代屬於這個階級的卻不到一成；此外，省籍之間的階級差異也表現在子代方面，儘管其差異已經不若父代明顯。這個研究證實：不同省籍的民眾之間存在顯著的階級差異。

駱明慶（2002）則以 1954 到 2000 年期間台大學生的學籍資料分析該校學生的組成，他發現台大學生的組成除了有明顯的城鄉差異以外，也有省籍的差異；在 1954-1991 年間，約 36% 的台大學生為外省籍，雖然近年比例已經逐漸下降，但省籍間的差異仍顯著存在。儘管這個研究僅以台大學生為分析對象，但在某種範圍內也可以反映不同省籍之間在教育成就上的落差。

## （二）地域與階級的關係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版圖逐漸呈現「南綠北藍」的趨向，調查研究結果也證實這種現象。例如，徐永明（2000）分析 1994 年到 2000 年間台灣選民政黨支持的地域差別，結果發現：相對於北部地區，南部地區的選民近年來偏向支持民進黨，且其支持程度較為穩定，形成偏向綠色的南方政治。

此外，洪永泰（2000）以鄉鎮市區為單位，採用集群分析的方法探討 2000 年總統選舉之後民進黨的政治版圖，結果也發現民進黨得票實力較強的地區是以南部地區的鄉鎮為主，北部地區的鄉鎮明顯較少。這些結果大致印證「南綠北藍」的政治版圖分布。

在地域與階級之間的關係方面，耿曙、陳陸輝（2003b）從兩岸經貿互動的

衝擊著手，對台灣形成中的「南綠北藍」的政治版圖提出觀察。他們發現：台灣的四大地理區塊（即北、中、南、東），由於其經濟結構的差異，對「是否擴大兩岸經貿交流」表現出明顯有別的政治立場，可以據此分劃「泛藍」、「泛綠」各自的政治版圖。這個研究證實，不同地區之間階級結構的差異，造成政治立場上的區域落差，因而構築了政治版圖的藩籬；可見地域可能影響階級地位，進而造成政黨版圖的差異。

### （三）教育程度與階級的關係

社會學者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不僅是個人收入的條件之一，也是社會地位的基礎之一；不論是國外或國內的研究都證實，收入和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決定了職業的階層（蔡淑鈴、瞿海源, 1989）。此外，Wolfinger 和 Rosenstone（1980：23-30）的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則收入愈高，職業階層也愈高。這些研究的結論都指出，教育程度的高低與階級地位是正相關的。

游清鑫、蕭怡靖（2003：11）研究台灣民眾政黨認同的變遷與持續，其結果發現：在 1996 年以前，選民教育程度之高低對於藍、綠政黨的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然而，1996 年以後，相較於其他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偏低的民眾有較高的比例傾向認同泛綠政黨。由此可知，近年來台灣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在政黨取向的分布上，已經呈現顯著的差異。

吳乃德（1998）的研究也指出：本省籍和外省籍民眾不只階級地位有差異，階級流動的表現也有所不同，這種情況主要是教育成就的不同所造成的；其中，父代在政府部門的受雇身份，對其子女的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影響力。在他的研究樣本中，有將近一半的外省籍受訪者，其父代受雇於軍公教部門，統計結果證實

「公部門家庭」和「子女教育成就」之間的顯著相關。這個結果呼應上述駱明慶（2002）的論點，也間接證明教育程度與階級之間的顯著關係。

## 二、社會心理因素：統獨立場

「階級」在臺灣的政治影響力不如許多歐美國家來得強大，主要原因是臺灣並不存在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體系，左右派意識型態的分歧也不像西歐國家那麼鮮明。然而，倘若因此說臺灣缺乏以階級為基礎的意識型態分歧則是言之過早，因為有許多研究文獻已經證實臺灣最主要的意識型態分歧為統獨議題，而且統獨立場與階級地位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

統獨議題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重要因素，這個事實已經在實證研究裡得到普遍的證實。整體而言，贊成統一的選民比較偏向支持泛藍政黨，贊成獨立的選民則比較偏向支持泛綠政黨（吳乃德, 1992；徐火炎, 1998、2001；陳文俊, 1995；陳陸輝, 2000；盛杏媛, 2002）

任何議題要成為強而有力的政治分歧焦點，必須與某種社會區隔產生連結，讓政治團體或政黨可以依照社會區隔去動員群眾，並產生強而有力的動員效果。統獨分歧得以成為台灣最凸顯的政治分歧之一，除了因為它可以顯著地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也因為它與社會區隔產生高度的連結。舉例而言，盛杏媛（2002）分析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關係，結果發現：統獨議題是 1990 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政治議題，即使在控制了省籍與政黨偏好的情況下，統獨立場仍舊是影響選民投票對象的重要因素。此外，盛杏媛、陳義彥（2003）從議題與價值觀的比較，探討影響台灣政黨競爭的主要政治分歧，其結果發現：省籍、統獨議題與國家認同分歧仍舊是影響 2001 年立委選舉的最重要政治分歧；至於與階級關

聯性較高的社會福利議題<sup>6</sup>、環保與經濟議題則仍不十分凸顯，尚未形成重要的政治分歧焦點。不過，「階級」卻與統獨議題產生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因為教育、所得較低者比較偏向支持台灣獨立；由此可知，相較於階級議題，統獨議題反而更可能成為各政黨階級動員的有效工具。

也有學者從勞工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台灣各主要政黨基本上都是屬於右翼政黨，較傾向資本家、而非勞動者的利益（黃德北，2002：12）；即使過去與社會運動關係較為密切的民進黨，也是屬於意識型態光譜上的自由主義政黨，而非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政黨，不會從階級的角度關心勞動者的利益（黃德北，2001：11）。這個觀點可以說明左、右派意識型態的對立並不是台灣政治分歧的焦點；相較而言，統獨意識型態的分歧更能夠成為台灣政黨競爭的主軸。

耿曙、陳陸輝（2003b）的研究也證實，由於兩岸經貿交流對不同產業帶來不同的利害關係，以致於以工商服務業及高科技業為主的北台灣縣市因預期將自兩岸經貿交流獲利，而較傾向支持主張「擴大交流」的泛藍政黨；至於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南台灣縣市，因預期難以自兩岸交流獲利、甚至將因貿易或產業外移而受害，而較傾向支持主張「限制交流」的泛綠政黨。由此可見，不同的階級或產業對於兩岸交流會有不同的利害關係與立場主張，進而在統獨意識型態上出現顯著的差異。

---

<sup>6</sup>不過，陳文俊以 2000 年總統選舉的資料，比較「泛藍」與「泛綠」支持者在意識型態上的分野，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結論。他以多元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意識型態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統獨立場、社會福利、經濟與環保、改革與安定等四大議題中，只有「社會福利」議題是決定選民要投給連蕭配抑或扁呂配的顯著影響因素。因此，他認為泛藍及泛綠選民在「社會福利」議題的差異，正好反應選民心目中國民黨是「中上階層政黨」、民進黨是「中下階層政黨」的刻板印象（陳文俊 2003：65-66）。可見因為選舉類型之不同而可能使得每個年度的調查結果不盡相同。有關不同議題在歷年選舉中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力，可參考江肇國（2002）。



###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一、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可以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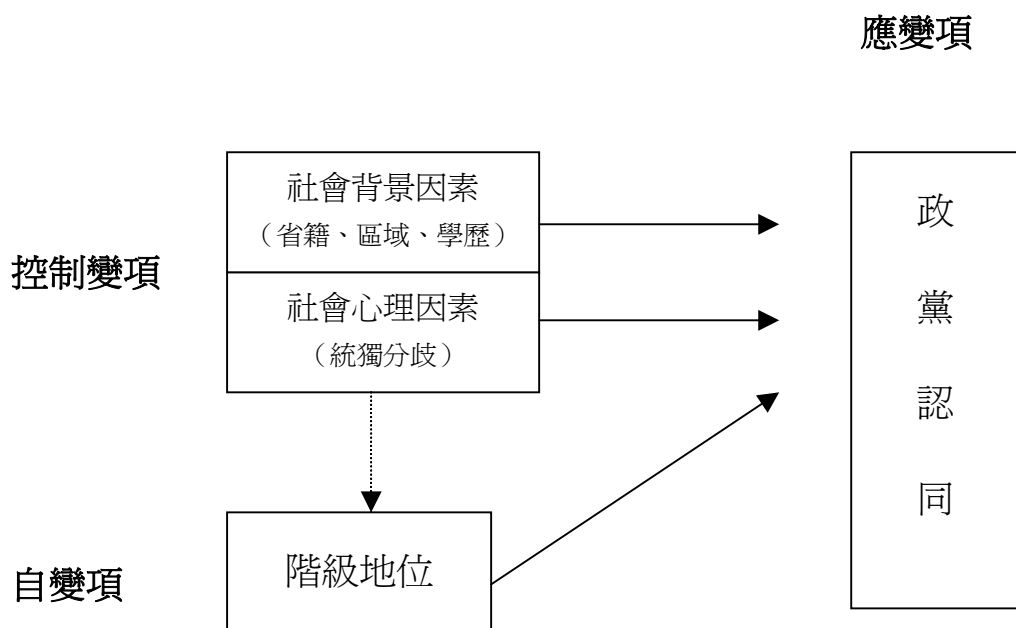


圖 1-1：論文研究架構圖

首先，我們將「階級」當做自變項，把「政黨認同」視做依變項，觀察選民的階級地位是否對其政黨取向有顯著的影響。其次，我們再將省籍、區域、教育程度以及統獨立場視為控制變項，一方面驗證他們與依變數「政黨認同」的關係，以確認它們是否為台灣重要的政治分歧因素；一方面觀察它們與自變數「階級」的關係，以了解「階級」對於政黨取向的影響是否與這些控制變數有關。最後，我們再採用統合模型，將各個變數一併加以觀察，探討在控制其它變項的情況

下，這些變數對依變項「政黨認同」的影響力為何，藉以釐清「階級」對於投票抉擇是否有實質的影響力，並對台灣「階級投票」的本質有更加深入的掌握。

## 二、章節安排

本文第一章藉由問題意識的驅使，提出兩個主要的探討主題，分別是「階級」與「投票」的關係、以及「階級」的實質影響力，這兩大研究主題不僅形成本文的研究架構，也成為本文章節安排的主軸。不過，經由本章對於研究文獻的探討與回顧，我們發現「階級投票」研究的爭議主要源自於測量與分析的方法；因此，本文將在第二章專文探討「階級投票」的測量與研究方法，並選擇適用於本研究的測量指標，再藉由測量指標的確立進而提出本文的主要變項以及研究假設。

本文從第三章開始進入研究主題的探討及研究假設的驗證。我們將藉由歷年選舉調查研究資料的分析，探討第一個研究主題：「階級」與「投票」的關係。這個主題分為兩個面向：首先，我們在第三章第一節探討台灣歷年選舉裡「階級投票」的情形，也就是比較不同階級的選民在投票行為上是否呈現顯著的差異；其次，我們將在該章第二節以貫時性分析的方式，探討各個階級的選民「階級重組」的情形，藉以觀察各階級選民在政黨認同上的變遷與持續。

第四章開始進入本文的第二個研究主題：「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這個主題也分為兩個研究面向，分別是「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因素之間的關聯，以及在控制其它政治分歧因素的影響力之後，「階級」對於政黨認同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第四章主要是探討第一個面向，也就是「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因素之間的關聯；第五章則探討第二個面向，也就是在控制其它政治分歧因素的影響力之後，「階級」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力為何。

在第四章第一節，我們首先分析在第一章文獻回顧的第三部份所提出的幾個主要社會分歧（包括省籍、地域與教育程度等社會背景因素，以及統獨立場這個社會心理因素）是否對政黨認同有顯著的影響，藉以驗證這些因素是否足以構成台灣主要的政治分歧。接著在第四章第二節裡，我們將分別探討「階級」與這些政治分歧因素之間的關聯性，以了解哪些政治分歧因素可能與「階級」具有顯著的關聯性，也為下一章的統合模型裡的變數組合鋪路。

在第五章第一節，我們將以「投票行爲」當做應變項，並以「階級」再加上第四章第二節所驗證的與「階級」有顯著關聯的各項政治分歧因素當做自變項，藉由統合模型的運用，將這些自變項一併加以分析，觀察在控制其它變項（政治分歧因素）的影響力之後，「階級」在歷年選舉當中是否對於應變項（投票行爲）產生顯著的影響力，藉以確認「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為何。其次，在第五章第二節我們分別針對各個自變項，以貫時性分析的方式探討它們在歷年選舉當中的實質影響力，如此，我們就可以了解哪些因素是台灣最主要的政治分歧、而哪些因素在控制其它變數之後就沒有實質的政治影響力了！

最後，我們將在第六章整理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結論，並指出本文的研究侷限與未來研究方向，為本文的討論劃下句點。